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中國近代
商業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美」郝著
陳潮

譯

陳絳校

中國近代 商業革命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朱金元
封面装帧 谢 烽

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美]郝延平著

陈潮 陈任译

陈 烽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34,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内精装 500)

ISBN 7—203—01438—8/D·302

定价 平装 13.95元 精装 16.75元

只限国内发行

(D260/5)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

Yen-p'ing Ha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 Los Angeles • London

根据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序

引人争论的“资本主义”一词，有多种解释，并且带有当代的^{xi}和与时代不合的涵义，但不管怎样，事实是在19世纪，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包括中国在内。在中国，资本主义商业阶段曾是一个最有生气和最具魅力的发展阶段，然而，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主要领域，没有一个部门比商业更受到学者忽视。

当我在6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美国和英国在“旧中国”大商行档案时逐渐相信，中国与西方的经济关系比通常设想的要更加生机勃勃，更加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日益确信这一研究主题的正确性：在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贸易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成熟，由此构成了一场商业革命。由于没有更好的代名词，我使用了引起争论的名词“资本主义”和“革命”，我希望这部书将有助于促进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从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早期中西接触的历史意义，愈来愈产生怀疑，转而专注于中国本土固有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不仅在美国由于它卷入越南战争而受到指责，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开展而成为最重大的罪恶。尽管如此，70年代后期以来，在美国，私人企业家精神和经济竞争重又焕发出一些光彩，而中国也开始了它令人敬畏的“外向大跃进”——面向西方的经济伸展。现在应该是以适当的^{xii}历史观点看待19世纪中西商业关系的时候了。

在本书中，我没有对近代中国的商业革命作一般的详尽考察，也没有专门对中西经济关系作这样考察。我宁愿将注意力集中在19世纪中西商业资本主义的范围、强度和显著特征上，评价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我还阐明近代中国历史上其他3个相关联的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经济帝国主义，以及条约口岸影响中国的历史作用。

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多年来得益于同许多师长、朋友和和同事的讨论与交往。费正清(John K. Fairbank)阅读了书稿的第一稿，并提出详细的富有价值的意见。刘广京首先介绍我对晚清西方在华商行档案作历史研究，我感谢他同我作令人激励和收获丰硕的讨论。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作为一个经济学家阅读了较早的一份手稿，并提出有关中国经济史方面重要的建议。王业键阅读了修订稿，在一般概念和历史细节两方面都给予重要的指教。我同样得益于加州大学出版社不知名的审稿人有价值的意见。我还感谢旺耶·法利斯(Wanye Farris)、简·帕克·法利斯(Jane Park Farris)和理查德·赖斯(Richard Rice)给予有关编辑事务和一般历史问题的频繁磋商。我的妻子冰翰(Pin-han)在准备书稿的整个过程中，给我巨大帮助。我向他们所有的人致以谢意。

由于已故的约翰·凯瑟克爵士(Sir John Keswick)的善意，怡和洋行惠允查阅藏于剑桥大学图书馆的怡和洋行历史档案。怡和洋行的阿伦·里德(Allan Reid)阅读了手稿的初稿，并提出若干有关洋行在中国活动的意见。我还感谢迪利普·巴苏(Dilip Basu)、萨拉·R·布兰希(Sarah R. Blanshei)、瞿素真(Ch'ü Shu-chen)、勒罗伊·P·格拉夫(Le Roy P. Graf)、罗伯特·G·兰登(Robert G. Landen)、罗伯特·W·洛弗特(Robert W. Lovett)、小约翰·H·莫罗(John H. Morrow

Jr.)、杰克·E·里斯(Jack E. Reese)和吴文津，他们在我研究的各个阶段都曾给予帮助和鼓励。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历史系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在打印几份手稿方面。我还感谢南希·A·布鲁门斯托克(Nancy A. Blumenstock)对原稿作细致编辑；感谢洛厄尔·迪特(Lowell Ditter)、格兰特·巴恩斯(Grant Barnes)、菲莉斯·基伦(Phyllis Killen)和巴巴拉·D·梅特卡夫(Barbara D. Metcalf)帮助本书出版。 xiii
我向给予财政支持的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美国哲学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以及诺克斯维尔的田纳西大学表示感谢。

我感谢下列机构的成员给予各种形式的协助：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麻省密尔顿对华贸易博物馆，国会图书馆，埃塞克斯研究所，胡佛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历史学会，诺克斯维尔田纳西大学哈斯金图书馆，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图书馆，伦敦公共档案局，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图书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傅斯年图书馆，台北中国海关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东京东洋文库。

郝延平

于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沿海的自由贸易	14
广州和公行以外的贸易	14
港脚贸易和英国散商	20
其他自由商人	28
第三章 货币的新形式	37
银元的引进	38
纸币和银行票据的使用	51
鸦片的货币功能	60
新形式的货币数量和意义	71
第四章 信贷的扩展	80
汇票、银行汇票与拆票.....	81
庄票	89
抵押与内地放款.....	100
信贷的局限与意义.....	111
第五章 市场的扩大：鸦片贸易	124
旧广州时代的经营.....	125
条约制度下的鸦片走私.....	136
合法化以后的贸易.....	147
第六章 农产品的商业化：内地茶叶收购	154
茶叶贸易的扩展.....	155
走向制度化.....	166

第七章 竞争的加剧	183
竞争的精神	184
出口贸易	191
进口贸易	211
航运贸易	218
第八章 利润的追求	238
中西共生	238
合伙贸易	258
多样化的投资	265
第九章 面向最大的利润	275
附股:外国企业中的中国人投资	275
西方名义下的中国人企业	290
巨额骤得的利润	300
第十章 市场风险与不稳定性	311
政治动乱	311
市场波动	324
投机交易	331
第十一章 商业亏损与破产	343
商业亏损	343
破产	355
1883年的金融危机	362
第十二章 结论	375
参考书目	399
征引档案	428
外人译名	430
企业译名	441
船只译名	448
校后记	453

第一章 导 论

19世纪中国同西方的经济关系，促进了成熟的商业资本主义¹，这一商业资本主义构成一场商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中国沿海地区经历了新的商业活动的酝酿，从中显露出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在19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市场结构、商业的金融方面、贸易中心、航运以及经营方式等变化如此广泛、显著和迅速，以致从总的后果来看，似乎是革命性的。这些变革既在结构方面又在功能方面，它们造成一种与多少世纪以来存在于传统中国的商业活动明显不同的经济形态。在本书中，我将对这场商业革命的范围、强度及其显著特征加以考察，并就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出评价。

“资本主义”一词含义笼统不清，带有与时代不合的和当代的涵义。这一现代词语(约创于1870年)就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仅仅从20世纪初才开始流行(马克思几乎未注意到此词)。从此以后，这一词语便被广泛使用，并且被大量滥用。尽管存在争论，但我仍将使用“资本主义”一词，这首先因为某些复杂的经济结构在世界各地产生时，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就都在为它们自己的名称而大声疾呼。的确，如果这一词语被使用得如此之多，这是因为有它的需要，或者有一个用于相同目的的词语的需要。其次，还没有替代它的其他词语。事实上，使用“资本主义”²一词的最好理由，是因为还没有人找到一个更好的词语。⁽¹⁾

就我使用的意义而言，资本主义系指一种以财产私有制、

企业具有获取利润和竞争的自由，以及个人消费者具有选择的自由为特点的经济制度。当这个制度以贸易而非以工业为重点时，它被称作“重商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或“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虽然从资源分配经济学和资源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受到了批评，但是，一般仍承认它是一种有效的生产和交换的机制。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通常出于道义上或文化上对这种制度具有诸如浪费、不平等和私人经济力集中这类特点的非难。但无论它有怎样的缺陷，资本主义制度毕竟极大地改变了近代世界。^{〔2〕}那么，中西贸易究竟如何推进了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商业革命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其结果又如何呢？

就某种意义上说，这里使用“革命”一词并不恰当，因为中国

〔1〕 对这个问题的一般讨论，见费南德·布劳德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1400~1800年》，米丽亚姆·科肯译（纽约，1975年），页xii-xiii；《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的反思》，帕特丽夏·兰南译（马里兰州巴的摩尔，1977年），第45—48页。布劳德尔在评论最广泛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一词时写道：“我可以有点武断地说，它在1902年就已开始，当时沃纳·桑巴特出版了他的名著《现代资本主义》一书。”（《反思》，第46页。）

〔2〕 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对许多批评资本主义的学者来说，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如布劳德尔说：“合作者之间的基本不平等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都是显而易见的。”（《反思》，第62页。）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写道，两种世界制度——具有再分配经济的世界帝国和具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世界经济——都明确包含着不平等的报酬分配。”（“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兴起和未来的衰亡”，见其所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英国剑桥，1979年〕，第21—22页。）亦见其所编《世界不平等》（蒙特利尔，1975年）。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从匮乏的岁月通向潜在富裕的岁月的道路，这个事实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承认，他们在1848年写道，这种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纽约，1964年，第10页。）“重商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和“商业资本主义”(commercial capitalism)在本书中交替使用。*

* 这两词除原著同时并列注出原文外，中译本均译作“商业资本主义”。
——译者

沿海地区贸易的基本变化已经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只是在开始时几乎未被人们所注意。在中国和西方，这一商业革命都是一个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就国内说，中国在1683年满族有效地统一国家以后，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和平与繁荣阶段。在18世纪“中华升平盛世”(Pax Sinica)，中国经济广泛发展，人口增长，地区间贸易扩大，城市化迅速，以及手工业发展，都是有说服力的例子。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欧洲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经济收缩和巩固以后，集聚了强大的冲击力，在1750年左右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展。欧洲的18世纪，不仅是费南德·布劳德尔所称“一个普遍经济加速的世纪”，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长期的经济扩展的开端。〔3〕

19世纪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迄今为止致力于工业企业，特别是轮船、矿山、棉纺织制造业、铁路和军事工业的研究。〔4〕商业部分基本上被忽视了。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资料，工业、农业

〔3〕 经过8年战争，清朝康熙帝于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两年后他又收复了台湾。从1683年全国统一到19世纪初年，中国实际上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扩展。一般看法可见王业键：《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年》（台北，1981年），第13—15页；王业键：《中国货币制度的演变，1644—1850年》，收入侯继明、于宗先编《近代中国经济史》（台北，1979年），第434—435页。刘石吉《清代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兴起》（台湾大学1975年硕士论文）提供了一个可广泛用于地方史研究中有关市镇兴起的详细说明。关于商人的活动，见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年）。关于近代欧洲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见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2卷（纽约，1980年），第24—29、130页；布劳德尔：《资本主义与物质生活》，第27页。

〔4〕 例如，见刘广京：《19世纪中国的轮船企业》，载《亚洲研究杂志》第18期，第435—455页（1959年3月）；费维恺：《中国早期工业化》（麻省坎布里奇，1958年）；埃尔斯沃思·C·卡尔逊：《开平煤矿，1877—1912年》（麻省坎布里奇，1971年）；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1955年）；李国祁：《中国早期的铁路经营》（台北，1961年）；王尔敏：《清季兵工业的兴起》（台北，1963年）。

和手工业都已有多卷本的汇编,而商业方面几付厥如。〔5〕研究中西商业关系,首先涉及广州制度时期(1757—1842年)。〔6〕对鸦片战争以后时期商业发展缺乏研究的原因何在?部分答案可在认识中国同西方关系的方式中找到。许多人都认为,中西贸易曾是中国“开放”的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一旦中国实际上被“开放”,它的历史意义便消失了。而且人们普遍主张,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工业而不在于商业。然而我将指出:中西贸易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同西方的关系方面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这一贸易无论是为了它自身的理由,还是作为工业化的一个跳板,都显著地增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姑且不谈经济发展,商业凭其本身的地位也是值得研究的。如果一个事件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这一事件影响人数多寡,那么在19世纪中国,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是商业,而不是工业。在商业阶段,商业企业更是主要的,从投资的份额、雇佣的人数、价值的增加以及收入的分配来看,商业活动支配着工业企业,这是显而易见的。近代经济部门中,最大份额的利润不是来自制造业,而是来自贸易和金融业。在贸易中,最大部分的货物不是从工业获得,而是从传统部门(农业和手工业)中获得。

〔5〕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北京,1957—1961年);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1840—1895年(北京,1957年);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895—1914年(北京,1957年);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年(北京,1957年);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年》(北京,1957年)。有关商业的一部值得注意的汇编是《上海市棉布商业》(北京,1979年),此书篇幅不能与上述史料汇编相比。它在最近出版不久。

〔6〕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43年》*(英国牛津,1926年);迈克尔·格林堡:《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1800—1842年》(英国剑桥,1951年);路易斯·德米尼:《中国与西方》(巴黎,1964年);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湾台中,1960年)。

* “1635—1843年”应为“1635—1834年”。——译者

中国晚清贸易稳步扩展，部分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和财富不断积累，而且还由于专门化进程持续进行，导致更多的人口流入商业系统。这些趋势在沿海地区表现最为强烈，由于若干原因，19世纪商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始在这些地区露出曙光。私有财产和由此产生的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在所谓“条约制度”下，受到强有力的保护。资本的积累同企业的存款和利润两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发挥信贷功能的基本机构——作为存款和贷款媒介的银行——建立起来了。最后，因为沿海地区远离中国儒家社会的中心，而且私有财产更容易得到公认，利润制度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成为可以维护的了。^{〔7〕}

典型的沿海地区的生意人，是兼有贸易家、银行家和投机家职能的商人。他的营业建立在市场需求上，他决定供应最畅销的产品。他最活跃的领域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力市场；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改进交换机制，而不在于开办工厂。中西商业在充分的资金供应和易于获得而又花费不多的信贷刺激下，率先拓展了市场，从而加剧了经营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与此同时，竞争是激烈的。由于进口、出口和航运贸易业务的扩展，资本主义便在沿海地区繁荣兴盛。⁶

本书中，我在许多方面根据现存有关条约口岸商业的文献。首先，这一关于商业发展论题的研究，跨越一个很长的时期——从广州制度下的18世纪后期，经过1842年后的条约时期，直至19世纪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以往许多中西经

〔7〕关于中国人口的一般讨论，见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麻省坎布里奇，1959年）。在儒家社会价值体系中，商人居于最底层，手艺人稍高，但仍低于农民，士在最高层。

济关系研究的范围更广。^{〔8〕}其次，我考察沿海商业资本主义所有的显著特征。自由贸易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在旧的广州制度时代，中国对外贸易被限制在广州，并由公行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这一观点已为人们一般接受。在第2章中，我通过探讨一个重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课题——中国“商舖”的兴起和与其并行的西方散商的现象，对这一观点提出疑问。第3章考察3种货币新形式的引进和推广。对鸦片的货币功能作广泛的讨论，并对货币供应总量作出估算，对它的经济衍生结果作了评价。“苏州制度”这一新颖的机制也加以详细讨论，中国商人依靠这种新颖的机制，在西方贸易商的促进下，从上海携带鸦片去苏州采办生丝。在第4章中，我考察19世纪条约口岸的信贷交易如何不同于传统的做法。我估算了沿海地区的利率，指出它们的趋势，解释这一利率为什么明显低下，并且评价它们对中国整个经济的影响。

7 在第5章和第6章中，我以最重要的商品进口(鸦片)和出口(茶叶)贸易的大量记载来说明市场的扩展。

8 茶叶贸易的扩展，标志着农产品的商业化。在这几章中，我提供了新的详细的鸦片贸易和内地收购丝茶的日常业务记载。我还对有选择权贸易、贸易的前景、以合同为基础的经营、通过预付款的交易，以及新的分销网络和销售技巧的引进等问题作了

〔8〕 重田德对茶叶的研究限于湖南，波多野善大类似的著作主要根据19世纪中国茶叶的西方文献，仅论述鸦片战争以前时期。见重田德《清末湖南茶叶生产结构——以五口开港后为中心》，《人文研究》，第16卷第4期，第369—418页；波多野善大《中国输出茶叶之生产结构》，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Ⅱ，史学，第1期，第183—210页（1952年）。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麻省坎布里奇，1980年）讨论卷烟生产和销售，主要在于20世纪。我不详述生丝贸易，这方面李莉莲《中国蚕丝贸易》（麻省坎布里奇，1981年）已作细致考察。

阐述。没有竞争就没有资本主义。〔9〕由于在中国的西方贸易行经营相当份额的中国对外贸易，而且据推测还拥有垄断商品供应的力量，人们经常断言，它们遏抑竞争，对中国对外贸易起了极度的抑制作用。这些出口商行被描绘成损害中国生产者，操纵价格，导致价格低落，阻碍了生产。同样地，有人认为，进口商行以高于纯粹竞争下形成的要价，抑制了进口。在第7章中，我考察了这些论断的可靠程度，并且讨论外国贸易商是否热衷于彼此竞争。鉴于研究中西关系的其他学者专注于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营业竞争，〔10〕我将强调所有沿海商人-实业家 (merchant-businessmen) 之间的一般竞争，不管这些竞争者是本地人还是外国人。我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探讨，为研究19世纪中西经济竞争增添一个新的方面。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和利用积累起来的财富从事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生产与商品及劳务交换的基础上的经济制度。在第8章和第9章中，我调查研究沿海商人追求利润的方法。尽管其他学者已经简略地涉及这一论题，〔11〕我试图对中国和西方商人之间的共生关系 (symbiotic relationship) 作详细的多方面的阐述。对于合伙贸易以及中国人在外国人的名义下从事经营的做法，我利用档案材料，作了详尽的阐述。我同

〔9〕 竞争是资本主义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的说法是有争论的。多数学者承认竞争的重要性，而布劳德尔则强调垄断的作用。（《反思》，第57、111、113页。）

〔10〕 例如，刘广京：《中英轮船航运竞争，1873~1885年》，载C·D·考万编：《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史》（纽约，1964年），第49—78页；罗兹·墨菲：《局外人》（密执安州安阿伯，1977年）；高家龙：《中国的大企业》。

〔11〕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事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是一个细致的研究，但汪没有使用英、美在华最重要的商行的档案。这些档案表明，附股活动存在广泛而且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认识。G·C·阿伦和A·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伦敦，1954年），简要提到中国商人对这种和保险一样的西方经营做法的兴趣。

时估计了中国人投资外国企业的总额，对商业利润收益率也作了估计。最后，我还探讨一个流行的观点，即所谓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短缺。

商业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伴随市场扩展而来的不断增加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但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者还没有深入探讨这一范围广泛的问题。在第 10 章和第 11 章中，我主要根据美国和英国在中国商行的记载，对市场波动、投机活动、经营亏损、破产和金融危机作详细说明，并力图将这些现象放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范围中考察。

在详细考察中西贸易时，我将一般阐明关于世界范围资本主义的争论，特别阐明与中国社会和经济历史有关的问题。第一个争论的问题涉及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对这一问题，本世纪 50 年代中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曾展开过热烈的争论。〔12〕中国也受到影响，但在这一点上与中国更为密切相关的，不是这样一种过渡的时间和性质，而是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在同西方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以前，中国曾否存在向资本主义自发发展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手工业和农产品方面呢？

中国大陆许多人断言，发端于 15 和 16 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在整个乾隆时期（1736—1795 年）稳步发展。相当数量和规模的手工工场——尤其是纺织业、陶瓷业和传统的矿业

〔12〕 这一争论由莫里斯·H·多布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研究引起。有关不同的观点，见罗德尼·希尔汤编：《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伦敦，1976 年）。关于最近强调过渡性质的看法，见沃勒斯坦：《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单一转变还是多项转变？》，收入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 138—51 页。